

# 三民主義在臺灣

## ——楊逵主編《一陽週報》的時代意義<sup>i</sup>

黃惠禎<sup>ii</sup>

### 摘要

1945年9月1日由楊逵創辦於臺中的《一陽週報》，是目前所知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臺灣最早發行的雜誌，在臺灣出版史上的重要地位自不待言。由於創刊於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與中國政府正式接收臺灣之間的政治空窗期，主編楊逵對於政局更迭之回應由此可見一斑。在以解放委員會推動政治活動受挫之後，楊逵藉由《一陽週報》宣揚孫文思想與三民主義，對臺灣民眾進行政治思想的啟蒙，並以此規劃戰後新臺灣的理想藍圖。回顧楊逵的一生，《一陽週報》中所憧憬的三民主義美麗新世界始終未曾來到，然該刊清楚標誌著戰後初期臺灣人民熱烈歡迎中國政府的心情，以及追求民主自治與建設均富社會的熱切期待，足以窺見戰後政治轉型期中臺灣人的精神圖像，有其無法抹滅的時代意義。

**關鍵詞：**楊逵、一陽週報、三民主義、戰後初期、孫文

---

<sup>i</sup> 本論文承蒙兩位無具名審查委員與本系邱雅芳助理教授惠賜修改意見，謹在此表達由衷的謝意。

<sup>ii</sup> 國立聯合大學台灣語文與傳播學系副教授。

##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in Taiwan: The Significance of Yang Kui's *Yi-Yang Weekly***

**Huang, Hui-Chen\***

### **Abstract**

*Yi-Yang Weekly*, founded by Yang Kui in Taichung on September 1st, 1945, is the first magazine published in Taiwan after World War II. Without speaking, it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Taiwan's publication. Due to the first issue of the magazine released on a political interregnum between the surrender of Japan and the handover of Taiwan to China, its content obviously reflected Yang Kui's political opinion on the vicissitude of politics.

After the defeat of the political movement held by his Liberation Committee, Yang Kui promoted the thoughts of Sun Wen and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through *Yi-Yang Weekly*, in order to enlighten Taiwanese people on political issues. Furthermore, he also intended to make an ideal plan for Taiwan after World War II by means of this magazine.

In his whole life, Yang Kui did not see the arrival of the world constructed according to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a beautiful world longed for by him. Nevertheless, given that Yang Kui's *Yi-Yang Weekly* marked the welcoming of Taiwanese people for China during the early days after World War II and their expectation for a society of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Taiwan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National United University

democracy and wealth, it indeed expressed the spirit of Taiwan people during this political transition. In this regard, Yang Kui's *Yi-Yang Weekly* has its significance.

**Keywords :** Yang Kui, *Yi-Yang Weekly*,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the Early Post War Period, Sun Wen

## 一、前言

戰後面對中國接收的政治新局，為擺脫日本殖民文化的影響，順利與中國文化接軌，臺灣知識菁英紛紛投入臺灣社會的重建。1980年代，葉芸芸在調查國內外各大圖書館與私人收藏後發現，戰後初期從受壓榨的殖民地子民地位中解脫，各式各樣的文化活動蓬勃展開，其中又以期刊雜誌最為豐富，智識份子期望能藉著個人文章，對建設新臺灣的事業表達些微見地。研究中並指出，1945年到1949年間臺灣出版的報紙雜誌有四十三種，還有二十餘份未能找到原版，只能從同時期報刊上的廣告與報導文字間接證明其存在。四十三份可見到原版者依出刊時間排列之後，楊達主編的《一陽週報》列在第一，並註明「一九四五年九月間在臺中市創刊。每週六出版。同年十一月十七日出版第九期後停刊」<sup>1</sup>。

過去僅見由楊達遺物中發現的「紀念 孫總理誕辰特輯」，也就是葉芸芸所言最後出版的第九號，筆者透過楊達家屬取得影本後，曾經針對其內容做過初步的介紹<sup>2</sup>。今年（2011年）筆者參與由國立臺灣文學館委託，《文訊》雜誌社主編封德屏女士主持的「《台灣文學期刊史編纂暨藏品詮釋計畫》光復初期階段」，負責撰寫包含《一陽週報》在內的雜誌提要，透過計畫助理獲得國內各大圖書館收藏的《一

---

<sup>1</sup> 葉芸芸，〈試論戰後初期的臺灣智識份子及其文學活動（一九四五年——一九四九年）〉，《文季》2卷5期（1985.6），頁5-6。

<sup>2</sup> 請參閱拙著，《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四〇年代楊達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9），頁284-290。

陽週報》創刊號與第三、七、八、九、十號，以及第六號之部份原件影本，並由計畫助理陳怡璇提供的拍賣網消息，獲悉臺中地區私人收藏有第十二號<sup>3</sup>，確認《一陽週報》早在戰爭結束滿半個月的1945年9月1日即已正式創刊<sup>4</sup>，並至少持續發行至同年12月9日的第十二號，就此推翻了雜誌在1945年11月17日的第九號之後停刊的錯誤認知。

《一陽週報》正式創刊的9月1日，恰好介於日本戰敗投降的8月15日，與10月5日葛敬恩率領幕僚飛抵臺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及臺灣警備總司令部前進指揮所在臺北成立前的政治空窗期；往後則經歷了10月17日中國軍乘美軍艦艇登陸，以及10月25日在臺日軍受降與中國政府正式接收臺灣的過程。其間日本殖民體制完全退場，取而代之的是中國統治勢力籠罩全臺。在這樣特殊的時空背景下，隨著國籍身分的轉換，臺灣的整體氛圍從大和民族主義與皇民化運動，瞬間轉向與日本敵對的中華民族主義與中國文化移動，其快速複雜的歷史變遷與文化環境實不難想像。

目前筆者所掌握的各號中，除了楊逵日治時期的小說創作〈犬猴鄰居〉（〈犬猿鄰組〉）改寫後在此重新發表，甚至連載了中國知名左

---

<sup>3</sup> 創刊號與第三號收藏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第六號僅見之部分為臺灣大學圖書館楊雲萍文庫館藏，第七至第九號由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第十二號目前未見有任何圖書館收藏，然曾在露天拍賣網之文獻收藏品拍賣，因出價低於底價而未能成交，參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1315585350>，2011.6.8 瀏覽。

<sup>4</sup> 根據藍博洲1993年1月6日及3月15日在臺北市許宅採訪許分所得，《一陽週報》創刊於9月22日。以《一陽週報》創刊號上的發行日期來看，許分的記憶顯然有誤。藍博洲，〈楊逵與中共台灣地下黨的關係初探〉，《批判與再造》12期（2004.10），頁44。

翼作家茅盾的小說〈創造〉等文學創作之外，包括〈一陽來復〉、蔡嵩林〈偉大的光明〉與小民〈夢與現實〉（〈夢と現實〉）等新詩體裁的創作在內，絕大多數是政治思想方面的文獻，或與時局有關的報導、感言和評論。當時臺籍人士如何應變與思考未來，對於中國國民黨與蔣介石政權的民心向背如何，想必可以由《一陽週報》略窺一二。因此本論文將針對《一陽週報》的形式與內容兩方面進行分析，揭露楊達在當時的政治態度與行動，藉此勾畫臺籍人士面對政權遞嬗時的精神圖像。

## 二、發行概況與創刊之目的

戰爭結束後，為慶祝「一陽來復」（光復），楊達把首陽農場更名為「一陽農場」<sup>5</sup>。《一陽週報》發行所為一陽週報社，社址即楊達住處的一陽農場，刊名中的「一陽」由此而來，兼具發行地與「慶賀臺灣回歸祖國懷抱」（光復）<sup>6</sup>的雙重意義。所謂「週報」者，從各號封

<sup>5</sup> 1982年11月8日，楊達在東京接受戴國輝、若林正文訪問時曾說：「戰爭中我在台中種地，並將農場取名為首陽農園（從伯夷、叔齊各餓死首陽山的故事中取首陽二字），但在日本戰敗後，又將其易名為『一陽農園』（從一陽來復中取一陽二字）。」見〈台灣老社會運動家的回憶與展望——楊達關於日本、台灣、中國大陸的談話記錄〉，原載於《台灣與世界》21期（1985.5），收於彭小妍主編，《楊達全集》第十四卷「資料卷」（臺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2001），頁281。

<sup>6</sup> 楊達提到《一陽週報》的由來時曾說：「光復初，我辦『一陽週報』，慶賀台灣回歸祖國懷抱。」見楊達口述，王麗華筆記，〈關於楊達回憶錄筆記〉，原載於《文學界》14期（1985.5），收於彭小妍主編，《楊達全集》第十四卷「資料卷」，頁81。此外，楊達接受何昀訪問時也有類似的說法，他說：「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之後，我把『首陽農場』改名為『一陽農場』，並且辦了一份『一陽週報』，來慶祝台灣光復，從此我們可以站出來自己和平建國」。引自楊達口述，何昀錄音整理，〈二二八事件前後〉，原載於《台灣與世界》21

面或首頁標明的「每週一回禮拜六發行」、「每週一期星期六」，可知《一陽週報》預定每週發行一次。但第七號之後可能由於經費問題與鉛印排版印刷耗時較久，而有拖延至兩週或三週才出刊的現象。另外，第十二號封面雖仍標明「每週一期星期六」，上印出刊時間為星期日的12月9日，可能係排版時誤植所致。

關於創辦《一陽週報》的資金來源，楊逵曾經回憶說：

當時，戰後物資匱乏，不過關心文化的人頗多，朋友彼此出資濟助「一陽週報」。每一位贊助者，我都寫上他的芳名及贊助金額於小紙條，貼在壁上，足足貼了兩面牆，戲稱為「添油香」；並買來一部手轉輪印機（二二八事件後被沒收充公）。<sup>7</sup>

可見《一陽週報》得以創刊，有賴於一群朋友們在經濟上給予奧援。因此該刊不只展現出創辦人楊逵面對變局時的行動，也代表著臺灣人關心臺灣前途的意志。

至於出資者的身分，根據楊逵舊識許分的口述證言，「《一陽週報》主要出資者為林幼春之子林培英與李崇禮之子李君晰，其他便是小額捐款」<sup>8</sup>。出身霧峰望族的林幼春是享譽漢詩界的抗日詩人，曾贊助楊

---

期（1985.5），收於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四卷「資料卷」，頁89。

<sup>7</sup> 引自楊逵口述，王麗華筆記，〈關於楊逵回憶錄筆記〉，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四卷「資料卷」，頁81。

<sup>8</sup> 轉引自藍博洲，〈楊逵與中共台灣地下黨的關係初探〉，《批判與再造》12期，頁44。

達創辦的《臺灣新文學》足以出版三期的經費<sup>9</sup>。《一陽週報》創刊時林幼春已仙逝，長子林培英繼承乃父之風，義助楊達的文化運動有其歷史淵源。另一位主要贊助者李君晰為彰化市人，為參與創辦彰化銀行的李崇禮三子，事業版圖擴及銀行、飲料水、戲院等，日治時期曾列名《臺灣文藝》文藝同好者之列<sup>10</sup>，應該是由於喜好詩文而與楊達往來，並支持楊達的文化事業。

原以刻鋼板及手轉輪印機油印方式發行的《一陽週報》，從 10 月 27 日發行的第七號起改採鉛字印刷<sup>11</sup>，經費負擔更加龐大。楊達在週報內為變更成活字版請求捐款<sup>12</sup>，並在第七號所謂「一陽燈添油」中刊載襄助者的名單，除了團體名義資助的小梅農民組合、苑裡同志、布袋同志、三義同志之外，其餘六十七人多數來自楊達過去參與文化協會與領導農民組合時，活躍過的臺中、彰化、嘉義等地。其中，丁瑞彬是曾在戰後活躍於政治界的成功企業家，林錫金為臺中醫院院長，醫師林糊曾先後加入文化協會、臺灣民眾黨與臺灣文藝聯盟，謝富為臺灣農民組合成員，蔡嵩林曾發表在日本拜訪中國左翼作家郭沫若的紀錄<sup>13</sup>，漢詩人許文葵、李占春、林濤波亦列名其中，還有後來

<sup>9</sup> 廖偉竣（宋澤萊）訪問，〈不朽的老兵——與楊達論文學〉，原載於《師鐸》（1976.1.1），收於彭小妍主編，《楊達全集》第十四卷「資料卷」，頁 181。

<sup>10</sup> 見「文藝同好者氏名住所一覽」，《臺灣文藝》1 卷 1 期（1934.11），頁 89。

<sup>11</sup> 池田敏雄 10 月 10 日的日記中記載拜訪楊達家時，從他口中聽說「『一陽週報』最近要改成印刷版」，在這篇日記之後發行的即是 10 月 27 日以鉛字印刷的第七號。參見池田敏雄著，廖祖堯摘譯，〈戰敗後日記〉，《臺灣文藝》85 期（1983.11），頁 186。

<sup>12</sup> 參見〈お願ひ〉，《一陽週報》3 號（1945.9.15），頁 5。

<sup>13</sup> 這篇文章題為〈郭沫若先生的訪問記〉，發表於《先發部隊》1 號（1934.7.15），頁 36-39。

成為中共在臺地下黨員的女青年賴瓊煙與張金爵。從這份名單來看，楊逵創辦《一陽週報》的背後有不分年齡與階級，來自新舊文學兩大陣營，並包含左右兩派各路人馬的支持，顯示當時臺灣各界普遍關切臺灣的未來發展。

至於協助《一陽週報》之創辦與編輯工作方面，從現存油印版刻鋼板的字跡並非楊逵，並且包含多人的手跡來看，除了代表一陽週報社出席雙十節討論會的葉陶、許青鸞、吳北海等三人<sup>14</sup>，日治末期「首陽農園」時代因認同楊逵理念，圍繞在楊逵身邊的一堆年輕人，並參與由楊逵籌組於1945年8月31日正式成立的「新生活促進隊」的成員——賴瓊煙、張金爵、張彩雲、許分、蔡鐵城、施部生、呂煥章、何集淮……等人，也應該都是一陽週報社的核心成員<sup>15</sup>。其中一部分人士，例如賴瓊煙與張金爵並列名在「一陽燈添油」的名單當中，從提供資金與實際參與編輯工作兩方面給予楊逵最有力的支持。

目前收藏於臺南新化楊逵文學紀念館，由楊逵具名的一陽週報社邀稿信函中說：「臺灣光復、當以民為主、新建設多端、而頭腦空虛、深懼作事不得適正、以致禍誤茲、擇左記切實問題、期之公達、盼望

---

<sup>14</sup> 參見〈人山人海合歡此日——雙十節の盛典を語る〉，《一陽週報》7號（1945.10.27），頁1。

<sup>15</sup> 名單來自藍博洲調查所得，其中除了許分之外，其餘都列名在鍾逸人回憶新生活促進隊的成員中。由於《一陽週報》的創辦與新生活促進隊的成立大約同時進行，推測列在這兩份名單中的年輕人應該都是《一陽週報》與新生活促進隊的核心分子。參見藍博洲，〈楊逵與中共台灣地下黨的關係初探〉，《批判與再造》12期，頁44；鍾逸人，《辛酸六十年》（臺北：自由時代出版社，1988），頁284。

先生賜稿示教」，後並附有「主題」、「種目」、「枚數」、「截止」，用以標明文章主旨，文類為評論、隨筆、小說或詩歌，文稿長四百字稿紙幾枚與截稿日期。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收藏楊雲萍文書中，亦有指明給楊雲萍的同樣書函，發函日期為「民國 34 年 12 月 1 日」，上有楊達筆跡指定主題為「新建設」，種目為「詩」，並限定截止日為「十二月十日」<sup>16</sup>。再從第三號中的「紙上議會」刊登分別來自臺南、新竹兩地，有關臺灣人再教育的稿件<sup>17</sup>，該專欄並註明歡迎關於政治、經濟、產業、科學、教育、文化等諸問題建設的提案、批評討論，可知提供一個公開的版面，邀請臺灣各界人士以各自擅長的體裁書寫個人意見，集思廣益以謀求臺灣社會的重建，這是楊達創辦《一陽週報》的主要動機與目的。

根據楊達的回憶，《一陽週報》用以分送昔日農民組合與文化協會的朋友，提供討論的素材，希望能早日重建工農等人民的自主團

---

<sup>16</sup> 收藏於臺南新化楊達文學紀念館的《一陽週報》稿約信件為《楊達全集》編輯完成之後，楊達家屬從楊達遺物中發現並捐贈予該館，僅有一頁，是排版印刷的制式化邀請信函。筆者在擔任由國立台灣文學館委託，楊翠主持，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執行的「楊達文獻史料數位典藏計畫」協同主持人時，負責為標題〈一陽週報稿約〉的這份史料撰寫資料詮釋，圖片影像檔與資料詮釋內容請見楊達文物數位博物館，網址：

[http://xdcn.nmtl.gov.tw:8080/NmtlFront/result/result\\_detail.jsp?xmlId=0000253250&archiveOrDigital=digital](http://xdcn.nmtl.gov.tw:8080/NmtlFront/result/result_detail.jsp?xmlId=0000253250&archiveOrDigital=digital)。另一份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楊雲萍文書提供的邀稿信函，與楊達文學紀念館收藏者樣式及印刷內容一致，但已針對收件人楊雲萍的創作專長，由楊達本人以手寫方式填入邀稿的主題、文類與截稿時間等相關資料。

<sup>17</sup> 這兩篇在第三號中刊載的情況分別為：林（台南），〈再教育について〉，頁 6；賴（新竹），〈再教育対策委員会の設置を要望〉，頁 7。

體<sup>18</sup>。另外，池田敏雄 1945 年 9 月 18 日的日記上說：「楊逵郵寄三份油印的『一陽週報』來。」<sup>19</sup>所謂三份應指 9 月 1 日至 15 日發行的創刊號至第三號。可見戰後面對中國接收之際，楊逵並未以民族主義立場排斥日本人，反而有意讓當時身在臺灣的日籍文化界朋友了解臺灣人的動向，以及他對戰後轉型期中臺灣前途的擘畫，藉由創辦《一陽週報》推動臺灣的民主建設。

至於楊逵如何藉由《一陽週報》推動臺灣的重建，1980 年他在〈光復前後〉一文中曾說：

日本天皇親自宣布無條件投降……（中略）以後我就把「首陽農園」改成「一陽農園」，又得到年輕人的支援，發行「一陽週報」介紹 國父思想與三民主義，那時候，我們就覺得光復以後，在大家興奮的心情之下，向民族、民權、民生努力建設，臺灣一定可以成為三民主義的模範省。<sup>20</sup>

1983 年時也說過：「光復初期，我還活躍於當時的臺灣文壇，創辦『一陽週報』，宣揚三民主義」<sup>21</sup>。可見楊逵投身建設戰後新臺灣的方式，

---

<sup>18</sup> 參考戴國輝、若林正文訪問，〈台灣老社會運動家的回憶與展望——楊逵關於日本、台灣、中國大陸的談話記錄〉，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四卷「資料卷」，頁 281。

<sup>19</sup> 池田敏雄著，廖祖堯摘譯，〈戰敗後日記〉，《臺灣文藝》85 期，頁 183。

<sup>20</sup> 引自楊逵，〈光復前後〉，原載於《聯合報》副刊，1980.10.24，收於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四卷「資料卷」，頁 13-14。

<sup>21</sup> 楊逵口述，許惠碧筆記，〈臺灣新文學的精神所在——談我的一些經驗和看法〉，原載於

在於藉由《一陽週報》介紹孫文思想與三民主義，並以三民主義的政治理想作為規劃臺灣未來藍圖的典範。

### 三、孫文思想與三民主義的宣揚

戰後三民主義在臺灣大為流行，例如日本學者若林正文學生時代在回鄉探親乘坐的列車裡，曾經聽聞一名日本陸軍特務系統人士在海南島從事訓練工作時的經歷——戰爭一結束，部下中的許多臺灣青年們立即滿口的三民主義，並十分了解三民主義的內容，實在令人吃驚<sup>22</sup>。池田敏雄 1945 年的日記中也有兩段相關的記載，其中之一是蔣渭川的日光堂改為「三民書局」；另一則是角板山的部落會議上，一名臺灣公醫召集日本人、臺灣人、高砂族（原住民），宣稱三民主義就是臺灣人、日本人及高砂族「三民」的提攜，以及「三民食堂」、「民生會館」等招牌林立<sup>23</sup>。由此可見，甫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臺灣人對三民主義極為嚮往，但部分人士對其內涵並不清楚，甚至存在著不切實際的幻想。

從現存《一陽週報》各號刊載的文章來看，介紹孫文及其學說無疑是《一陽週報》最主要的內容。包括直接轉載或翻譯孫文著作中的〈中國革命史綱要〉、〈欲改造新國家當實行三民主義〉、〈農民大聯

---

《文季》1 卷 1 期（1983.4），收於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四卷「資料卷」，頁 37。引文中的一陽「週」報原誤植為一陽「周」報，此處的引文已予以更正。

<sup>22</sup> 戴國輝、若林正文訪問，〈台灣老社會運動家的回憶與展望——楊逵關於日本、台灣、中國大陸的談話記錄〉，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四卷「資料卷」，頁 282。

<sup>23</sup> 這兩段分別為 9 月 18 日與 10 月 7 日的記載，見池田敏雄著，廖祖堯摘譯，〈戰敗後日記〉，《臺灣文藝》85 期，頁 182 及頁 185。

合〉、〈中國工人解放途徑〉、〈總理語錄〉，並刊載由他人撰寫的〈總理遺訓——關於三民主義〉、〈孫文先生略傳〉、達夫〈三民主義大要〉等多篇文章，孫文誕辰紀念日當週刊出的第九號並特設「紀念 孫總理誕辰特輯」，一口氣刊出執筆人包括主編楊達在內的五篇紀念文章<sup>24</sup>，表達悼念與追思之意。

另外，一陽週報社也出版並銷售相關的書籍，包括《三民主義解說》、孫文《三民主義演講》、孫文《民權初步》（附〈五權憲法地方自治實行法〉）、孫文《倫敦被難記》、《第一次、第二次合刊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包爾林百克《孫中山外傳》，以及蔣介石《新生活運動綱要》等書<sup>25</sup>。同年 11 月 28 日，楊達又以「一陽週報社」的名義發行《三民主義是什麼？》<sup>26</sup>一書。1946 年復發行金曾澄《民族主義解說》<sup>27</sup>，熱烈傳達了對於三民主義研讀熱潮的回應。

根據楊達自述，他與三民主義的首次接觸應溯及到東京留學時期，當時是經由日文翻譯來閱讀，由此了解中國的國民革命與第一次

<sup>24</sup> 這五篇文章依序是：楊達〈紀念 總理誕辰〉、蕭佛成〈紀念 總理誕辰〉、鄧澤如〈如何紀念 總理誕辰〉、陸幼剛〈紀念 總理誕辰的感想〉、胡漢民〈紀念 總理誕辰的兩個意義〉。

<sup>25</sup> 書目綜合整理自《一陽週報》7 號，頁 8；《一陽週報》9 號，頁 9。然兩期書目略有差異，第七號之《孫中山外傳》在第九號中稱為《孫中山傳》。

<sup>26</sup> 《三民主義是什麼？》一書筆者未見，而是從賴澤涵總主筆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書前所附圖片頁得知此書。封面註明「初學必讀」，發行所是一陽週報社，地址「臺中市梅枝町一九」係楊達住處。

<sup>27</sup> 根據「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查詢結果，這本書收藏於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然前往調閱時，館員表示已佚失。

世界大戰後的民族自決運動<sup>28</sup>。楊資崩（楊達的長子）記得楊達在戰爭末期組織焦土會時，曾經以中井淳贈送的三民主義原版書教育青年<sup>29</sup>。根據鍾逸人的說法，《一陽週報》中刊行的有關三民主義的學術論著，是金關丈夫與中井淳兩位教授戰時從華南各地的學校與圖書館取得，離臺前因無法攜回日本而贈送給楊達<sup>30</sup>。池田敏雄 1945 年 10 月 10 日的日記明確記載，當日他帶著有關三民主義的書籍交給楊達夫人葉陶，夫人大喜<sup>31</sup>。目前尚無法確定楊達何時開始傳布三民主義，可確定的是戰後楊達出版《一陽週報》等和三民主義相關的書刊，確曾仰賴日籍友人提供資料。

當時的楊達之所以會對三民主義充滿信心，據他自己解釋係由於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強調「扶助農工」，於是在《一陽週報》予以介紹<sup>32</sup>。從《一陽週報》第八號開始連載孫文的〈農民大聯合〉與〈中國工人解放途徑〉，並刊登〈臺灣光復·土地還原〉與〈臺灣光復工要出頭·航空是新建設頭緒〉兩篇文章，分別介紹臺灣的農民與工人

<sup>28</sup> 廖偉竣訪問，〈不朽的老兵——楊達論文學〉，彭小妍主編，《楊達全集》第十四卷「資料卷」，頁 177。

<sup>29</sup> 楊資崩，〈我的父親楊達〉，《聯合報》，1986.8.7。

<sup>30</sup> 鍾逸人，〈我所認識的楊達〉，收於路寒袖主編，《台中縣作家與作品論文集：台灣文學研討會》（臺中縣豐原市：臺中縣立文化中心，2000），頁 521；鍾天啟（鍾逸人），〈瓦窰寮裡的楊達〉，《自立晚報》，1985.3.30，文中將「中井淳」誤植為「中井享」。

<sup>31</sup> 池田敏雄作，廖祖堯摘譯，〈戰敗後日記〉，《臺灣文藝》85 期，頁 186。

<sup>32</sup> 楊達說：「當時我對三民主義有『信心』。是因國民黨的第一天代表大會強調『扶助農工』，我在『一陽週報』予以介紹。」見陳俊雄訪問，〈壓不扁的玫瑰花——楊達訪談錄〉，原載於《美麗島》111 期（1982.10.30），收於彭小妍主編，《楊達全集》第十四卷「資料卷」，頁 222。

的階級運動現況，以及第十號的〈總理語錄〉特別收錄有關工農階級權益問題的談話，足以印證社會主義者的楊逵接受三民主義的原因，與工農階級獲得孫文重視有極大的關係。晚年楊逵也曾經說過：

今日台灣要建設「民有民治民享而均富」的三民主義模範省，就要切實記住孔子在「大同篇」所表現的福利社會的構想與「不患貧患不均」的觀念，也要切實記住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就是共產主義」的教示。

孫中山先生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雖然不同於馬克司主義——列寧主義，却是繼承孔子的大同思想，以達到均富，福利社會為目標的中國式社會主義——共產主義。<sup>33</sup>

由此可見，孫文有關均富、福利社會等主張，符合重視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信仰，楊逵是把三民主義作為科學的社會主義，亦即共產主義來接受。

除此之外，《一陽週報》創刊號特別選錄孫逸仙〈致蘇聯書〉，表達國民黨在完成其由帝國主義制度解放中國，及其他被侵略國家之歷史的工作中，與蘇聯通力合作的期待<sup>34</sup>，「展望」欄並迫不及待地引述

---

<sup>33</sup> 引自楊逵，〈「日據時代的台灣文學與抗日運動」座談會書面意見〉，收於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卷「詩文卷」（下）（臺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2001），頁390。

<sup>34</sup> 孫逸仙，〈致蘇聯書〉，《一陽週報》創刊號（1945.9.1），頁8。

同日《臺灣新報》有關中蘇同盟條約的新聞內容<sup>35</sup>，包括蘇聯將提供國民政府軍事的、精神的支援，不干涉中國內政，三個月內完成從滿州撤兵……等<sup>36</sup>，另在第七號的「週報」欄中刊載「雙十節夜晚蔣主席透過廣播對全體國民呼籲，特別強調為了謀求農工業及交通發展，應該學習蘇聯為了實現五年計畫所展示的那種勇猛心。」<sup>37</sup>展現了楊達對於中蘇兩國攜手合作的期盼，與對蘇維埃共產國度的嚮往，間接證明楊達所構築戰後臺灣的理想願景接近共產社會。

基於以社會主義改造臺灣社會的深切期待，並且對於三民主義建設下的臺灣未來深具信心，楊達乃熱衷投入孫文思想與三民主義的介紹。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眼見接收官員胡作非為的種種劣跡，臺灣民眾對國民黨所推行的三民主義逐漸失去信心。楊達說過：

戰後我開設「一陽農場」，並發行『一陽週報』，我想宣傳三民主義，印『三民主義』，但發生事件，沒人要看『三民主義』，五千本都成廢紙；朋友出了三萬元，都成廢紙。<sup>38</sup>

憶及戰後臺灣人民對於三民主義的認識時，楊達也說過：

---

<sup>35</sup> 參見〈中ソ新條約〉，《臺灣新報》，1945.9.1。

<sup>36</sup> 《一陽週報》創刊號，頁4。

<sup>37</sup> 譯自〈ソ聯が五ヶ年計劃實現に示した勇猛心に習へ〉，《一陽週報》7號，頁8。

<sup>38</sup> 引自陳俊雄訪問，〈壓不扁的玫瑰花——楊達訪談錄〉，彭小妍主編，《楊達全集》第十四卷「資料卷」，頁222。文中所謂「事件」應指二二八事件。戒嚴時期二二八事件為政治禁忌，因此以「事件」兩字代稱之。

簡單地說，民族、民權、民生的大致內容一般都是知道的。然而，在實際政治方面，盡與其背道而馳的情形在光復（台灣回歸祖國）後馬上就出現了。從大陸來台灣的官吏啦，接收委員啦，甚多人實在是很荒唐的。因此，甚至有人這樣解釋，不管是誰，即使是不清楚詳情的也都認為，三民主義的民族、民權、民生與台灣實際情況相去甚遠，甚至是全然相反。因此，在一般民衆之間，把三民主義說成是「三民主義」之類的各種說法在擴大開來，對現狀的不滿和反感也在逐昇級擴大。<sup>39</sup>

這兩段回憶顯示，由於國民黨的實際作為違背了三民主義的理念，在政治現實與心中期待差距甚大的情形下，二二八事件之後三民主義熱潮迅速退燒，印刷出版的五千本《三民主義》乏人問津，宣傳三民主義的書籍大部分售予臺中圖書館<sup>40</sup>，當時楊逵對國民黨政權的失望之情不難想像。

由於史料缺乏，《一陽週報》停刊時間不明，目前所知最晚出刊者為 1945 年 12 月 9 日發行的第十二號；一陽週報社則在 1946 年間還

---

<sup>39</sup> 引自戴國輝、若林正文訪問，〈台灣老社會運動家的回憶與展望——楊逵關於日本、台灣、中國大陸的談話記錄〉，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四卷「資料卷」，頁 282。

<sup>40</sup> 根據鍾逸人的說法，中井淳、金關丈夫致贈楊逵的書籍，後來除了文學的之外，大部分售予臺中圖書館。由於這些書的內容有些載入《一陽週報》，應該是在三民主義熱潮褪去後，沒人要看，幾成廢物，才被楊逵出售。參見鍾天啟，〈瓦窰寮裡的楊逵〉，《自立晚報》，1985.3.30。

發行過金曾澄《民族主義解說》一書，顯示該社在 1946 年間仍持續相關的出版活動。由於未見 1946 年後《一陽週報》的發行紀錄，筆者推測陳儀政府政策失當所引起政治、經濟各方面的社會亂象，連帶使得國民黨所標榜的三民主義失去民心，以介紹三民主義為主要內容的《一陽週報》也失去讀者的支持，遂在 1946 年左右面臨停刊的命運。

#### 四、解放委員會的組成與受挫

藉由《一陽週報》的創刊，楊達自身的政治理念與動向也有所披露。首先是在創刊號中楊達正式宣告：「因為波茨坦宣言的接受，臺灣解放委員會的任務大致完了，該委員會解散，全員聚集協力新臺灣建設運動之統合。」<sup>41</sup>關於解放委員會，目前可見的其他記載，最早來自於林獻堂日記 1945 年 8 月 23 日的記述：

楊貴、李喬松十時來訪，並持「解放委員會」之宣傳ビラ示余，余勸其勿輕舉妄動，所謂解放者，對何人而言也，舊政府已將放棄，新政府尚未來，而解放云云對誰而言也，此時惟有靜觀，切不可受人嗾使，以擾亂社會秩序也。彼等略能理解，唯唯而退。<sup>42</sup>

---

<sup>41</sup> 譯自《一陽週報》創刊號，頁 1。

<sup>42</sup> 引自林獻堂著，許雪姬編註，《灌園先生日記（十七）一九四五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0），頁 253。

這段記載揭露戰爭甫結束，楊逵即著手策劃組織「解放委員會」，並與李喬松連袂拜訪臺灣民族運動領導人林獻堂，尋求支持。從日記內容可以發現，林獻堂在變局中採取靜觀其變的謹慎態度，楊逵等左翼人士則迫不及待想有一番作為，並已著手從事組織性的政治行動。

1982年11月8日，在日本東京接受戴國輝與若林正丈訪問時，戴國輝曾就解放委員會一事詢問過楊逵，當時楊逵的回答是：「沒有『解放委員會』那樣的名稱，我確實在著手組織團體，日本警察也對此默認」<sup>43</sup>。兩日後，接受戴國輝與內村剛介訪問時，楊逵改口說：

臺灣總督府向國民政府正式投降的日期是十月二十五日，在這一天以前，我組織了解放委員會，意思是要總督府的統治權停止，我們的要求，特高課長（譯註：指的是臺中州廳警察內的特別高等刑事課課長）是以默認的方式接受了，當他向上面呈報時，上面卻回說不行，因此才想從文化方面做點事，也就是我剛才說的，出版了「阿Q正傳」。<sup>44</sup>

由於「解放」兩個字的敏感性，楊逵的反覆其詞，應該是顧慮到戒嚴體制下當局對左翼人士的迫害所致。綜合這兩段話來看，楊逵當時確

---

<sup>43</sup> 戴國輝、若林正丈訪問，〈台灣老社會運動家的回憶與展望——楊逵關於日本、台灣、中國大陸的談話記錄〉，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四卷「資料卷」，頁281

<sup>44</sup> 引自陳中原譯，〈楊逵的七十七年歲月——一九八二年楊逵先生訪問日本的談話記錄〉，《文季》1卷4期（1983.11），頁28。

實在組織能實質參與政治活動的團體，名稱即是「解放委員會」。此舉雖然獲得臺中州當局的默許，後來也由於更高層級的臺灣總督府不准而受挫，楊逵遂轉而從事文化事業。

在《一陽週報》中宣布解散解放委員會時，楊逵提及其背景因素在於所謂波茨坦宣言的接受，係指日本天皇於 1945 年 8 月 15 日公開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無條件投降，當然也包括接受波茨坦宣言中履行開羅宣言的內容，亦即臺灣與澎湖歸屬中華民國。8 月 17 日，當時全臺唯一的報紙《臺灣新報》介紹了何謂開羅宣言，包括其背景、發表共同聲明的各方代表，以及臺灣與澎湖群島將歸還中華民國等內容<sup>45</sup>。8 月 27 日及 9 月 1 日，該報又分別刊登了陳儀被任命為臺灣的接收委員與臺灣民政長官的消息<sup>46</sup>。8 月 20 日，林獻堂與臺灣總督府高層會面時，安藤總督曾親口表示：「凡所要作之事皆無不努力為之，如橋梁之修繕、軍屬戰死者遺族之救恤及武裝解除諸準備，不欲使將來引繼有缺憾之事。」<sup>47</sup>8 月 24 日，《臺灣新報》報導了安藤總督在本島人有力者來訪時，明確表示獨立運動或自治運動絕對不行<sup>48</sup>。顯見當時殖民政府的統治方針，在於恪遵裕仁天皇投降時的承諾，和平移轉臺灣的主權。中華民國接收臺灣一事不僅已成定局，臺灣民眾亦當

---

<sup>45</sup> 〈カイロ宣言とは〉，《臺灣新報》，1945.8.17。

<sup>46</sup> 參見〈臺灣に陳儀 接收委員〉，《臺灣新報》，1945.8.27；〈臺灣民政長官に陳儀任命〉，《臺灣新報》，1945.9.1。

<sup>47</sup> 引自林獻堂著，許雪姬編註，《灌園先生日記（十七）一九四五年》，頁 250。

<sup>48</sup> 〈時局急變と本島の今後 安藤總督談——全島民一九の團結 誠實熱心・新運命開拓へ〉，《臺灣新報》，1945.8.24。

已瞭然於心。

由於總督府對於主動解除武裝一事已有腹案，不須藉由解放委員會解除總督府的統治權，加以前述總督府與林獻堂的不予支持，儘管池田敏雄在 9 月 4 日的日記裡說：「楊逵（作家）取得臺中州當局的諒解，正在組織『臺灣解放委員會』」<sup>49</sup>，事實上，由於主、客觀條件的未能配合，早在 9 月 1 日發行的《一陽週報》創刊號中，楊逵即已公開宣布解散解放委員會；另一方面，由時任林獻堂秘書的葉榮鐘保存，於 1945 年 9 月 9 日發出，隔日將在臺中舉行國民政府籌備會的邀請信函中，楊逵以本名「楊貴」列名「事務分擔」的「庶務」之中<sup>50</sup>，顯示楊逵已聽取林獻堂的建議，放棄個人的組織行動，並配合中國政府接收的政治趨勢。爾後，《一陽週報》之創辦與三民主義的宣傳，成為楊逵主要投注心力之處。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間出土的臺灣總督府終末資料中，1945 年 8 月臺灣總督府警務局有關日本戰敗之後臺灣治安的報告，有這樣的一段描述：

從確保治安這點來看，當前的問題主要是令人憂慮的思想要注意人物，以及一般本島人當中保有濃厚民族意識者之動向。前者可能已預料到本島在接收前後會發生混亂，因而企圖在這段

---

<sup>49</sup> 池田敏雄作，廖祖堯摘譯，〈戰敗後日記〉，《臺灣文藝》85 期，頁 180。

<sup>50</sup> 戴國輝，〈狂歡與幻想的雜奏——光復在台灣〉，收於戴國輝、葉芸芸，《愛憎二·二八——神話與史實：解開歷史之謎》（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6），頁 13。

期間進行陰謀策劃，這樣的擔心並非不存在。目前這樣令人憂慮的具體情況並未發生，只有楊貴（台中州下在任作家、人民戰線派）預料在接收後，重慶軍閥政權會專恣橫暴，對此的牽制策略是必須先進行穩固同志思想基礎之工作。在此意圖之下，他採取了一些動作，但這僅止於顯示出楊貴單獨之思想的範疇，尚未對外部產生任何影響。<sup>51</sup>

這項記載揭示楊達並不信任以蔣介石為中心的國民政府，亦即所謂的「重慶軍閥政權」。為在接收後順利牽制中國政府，楊達認為必須為建設臺灣的思想工作預做準備；換句話說，即使後來接受國民政府接收臺灣的政治現實，楊達其實另有制衡當局的盤算。池田敏雄 10 月 11 日的日記說：「再訪楊達兄，談論有關三民主義的書、以及小說的出版事宜。訪客不絕，充滿活力。楊氏的運動漸漸上軌道了。」<sup>52</sup>其中所謂楊達的「運動」前提及「三民主義」，顯示兩者之間可能關係密切。筆者推測以解放委員會進行實際政治活動的不可行，促使楊達以《一陽週報》取而代之，配合當局宣傳三民主義的既定政策，在合法性的基礎上推行思想啟蒙的工作。

## 五、楊達對臺灣政局的立場

---

<sup>51</sup> 譯自臺灣總督府警務局於昭和 20 年（1945）8 月的報告「大詔頒發後二於ケル島內治安狀況並警察措置（第二報）」，收於鈴木茂夫資料提供，蘇瑤崇主編，《最後的台灣總督府——1944-1946 終戰資料集》（臺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4），頁 149-150。

<sup>52</sup> 池田敏雄著，廖祖堯摘譯，〈戰敗後日記〉，《臺灣文藝》85 期，頁 186。

戰後曾有傳言指出楊逵曾與林獻堂接觸，促成臺灣的獨立<sup>53</sup>。不過從林獻堂日記內容及後來歡迎國民政府的行動，足以證明林獻堂並未參與其中。至於楊逵的政治立場，學者蘇瑤崇曾援引前述總督府史料，楊逵認為重慶政府是專恣橫暴的政權，須先做好鞏固思想基礎的行動，將來才能牽制重慶政府云云，還有池田敏雄所言楊逵有過反對國民政府統治的行動，以及楊逵本人明白表示說他將「首陽農場」改為「一陽農場」，並創辦《一陽週報》，準備站出來自己「和平建國」，將戰後楊逵的政治抉擇指向臺灣獨立<sup>54</sup>。如今《一陽週報》創刊號的出土，提供了我們重新思索這個問題的重要線索。

在〈獨立運動反對〉一文中，以楊逵（代稱「楊」）與「張」的問答形式，詳細說明楊逵本人的政治思考。首先，楊逵認為 8 月 15 日戰爭結束之後，臺灣獨立運動已失去客觀依據的立場，正推行的是根據孫文三民主義的新臺灣建設運動，也是相隔五十年才回歸的中華民國的國民運動。其次，楊逵認為絕大多數人民相信國民黨政府至少會是實踐三民主義的政府，而且極度尊重民意，伸張民權，傾注熱情維持人民的生活安定。楊逵並表示把政治交給政治家的想法違反三民主義，違反民主主義，也違反國民黨的指導方針，而大家聚集在一起議論，從中發現具有創意的指導方針是民主主義政治的座右銘，還呼籲大家必須捨棄支配、被支配的觀念，為了統一意見，也為了臺灣的

---

<sup>53</sup> 鍾天啟，〈瓦礫寮裡的楊逵〉，《自立晚報》，1985.3.30。

<sup>54</sup> 鈴木茂夫資料提供，蘇瑤崇主編，《最後的台灣總督府——1944-1946 終戰資料集》，頁 41-42。

團結一致，大家必須努力對話，相互理解。最後表示認同張所言，為了全島的統一與大同團結，無論是黨派活動或分派行動都應該小心謹慎，並強調非常贊成各地同志前往「國民黨臺灣支部準備會」的意見<sup>55</sup>。

對話中，「張」憂心楊逵若果真從事臺灣獨立運動，將會導致臺灣的前途陷入大混亂，顯示至少有部份臺灣民眾不支持臺獨的理由，是希望在安定的狀態下重建戰後臺灣的新秩序，因而不願與中國接收臺灣的局勢相對抗。楊逵明確表示從事獨立運動之說是「謠言」，證明當時的他無意於追求臺灣的獨立。因此所謂牽制重慶政權或反對國民政府統治，僅能說明楊逵對國民黨政權有所疑慮。如果從社會主義者的立場來看，楊逵的思想與政黨偏好傾向於共產黨，與之對立的國民黨自然不是他心目中理想政權的首選。而楊逵之所以願意接受國民黨政權，是期許國民黨秉持三民主義的理想，在民主主義的前提下推動臺灣社會的重建。

至於所謂「和平建國」的意涵，在此有必要引證相關文獻內容加以釐清。例如 1982 年 5 月 7 日應邀至輔大草原文學社講故事時，楊逵這樣說：

八月十五日早晨聽到日本天皇廣播之後，我立即把「首陽農場」的招牌卸下來，換上「一陽農園」，因為這一天我們看到「一

---

<sup>55</sup> 〈獨立運動反對〉，《一陽週報》創刊號，頁 2-3。

陽來復」了。小時候就堅持的「民族自決」與「解放我們的土地」的宿願，已於日本天皇在廣播中向全世界證實了。

今天談的故事是，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一個小孩的心路歷程，這一年我已經四十歲，早不是小孩了，深深感覺到和平建國的重担正壓在我們的肩上，但我的許多朋友都興高采烈的表示決不退縮。<sup>56</sup>

1985年5月，楊逵逝世後公佈的生前訪談中也說：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之後，我把「首陽農場」改名為「一陽農場」，並且辦了一份「一陽週報」，來慶祝台灣光復，從此我們可以站出來自己和平建國。不過這段時間搞得亂七八糟，引起二二八事變。<sup>57</sup>

這兩段文字發表時還在戒嚴時期，臺灣獨立仍然是不可公開談論的禁忌性議題，曾經身為政治思想犯的楊逵、整理記錄者與發表園地三者，不至於全數缺乏政治敏感度。綜合上下文的脈絡來看，楊逵所謂的和平建國並非臺灣獨立，而是脫離殖民統治（即引文中的「民族自

---

<sup>56</sup> 引自楊逵，〈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孩子〉，原載於《聯合報》，1982.8.10，收於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四卷「資料卷」，頁29-30。

<sup>57</sup> 引自楊逵口述，何昫錄音整理，〈二二八事件前後〉，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四卷「資料卷」，頁89。

決」、「解放我們的土地」)之後，合併於中國(「光復」)，臺灣與從二次大戰中復甦的中國結合，一同為重新建設新中國與新臺灣而努力，其意涵並未指向臺灣的獨立建國。

除此之外，《一陽週報》選錄的其他篇章，也可以表明楊逵當時的政治態度。例如刊登〈中國國民黨黨歌〉(中華民國國歌)、〈一陽來復〉、蔡嵩林〈偉大的光明〉、〈慶祝雙十節〉、吳北海〈年輕人的熱血〉(〈若き血潮〉)、小民〈夢與現實〉等篇章，以及由更與(藍運登)擔任主持人，分屬三民主義青年團、學生聯盟、中民青年會、人民協會、一陽週報社等各路人馬共同出席，於三民主義青年團臺中分團籌備處召開的〈人山人海同樂此日——談雙十節的盛典〉(〈人山人海合歡此日——雙十節の盛典を語る〉)討論會紀錄等篇章，用以歌頌「光復」，並表達合併於「祖國」的歡欣。其中，〈慶祝雙十節〉一文之後附有「雙十節即國慶日、就是十月十日、革命烈士於武昌推翻清朝、建設國民政府、中華民國新生之日。」<sup>58</sup>的簡短說明，向對於「雙十節」一詞陌生的臺灣民眾介紹其歷史意義。

再者，整理自《臺灣新報》社說大意的〈蔣主席與日本〉，推崇蔣介石是現代中國識日本的第一等政治家<sup>59</sup>。當時的楊逵並將自己領導的負責清掃街道、維持臺中街頭秩序，並兼有改造社會理想的隊伍取名為「新生活促進隊」，呼應蔣介石號召的「新生活運動」<sup>60</sup>。另外，

<sup>58</sup> 《一陽週報》6號(1945.10.6)，頁2。

<sup>59</sup> 〈蔣主席與日本〉，《一陽週報》3號，頁3。

<sup>60</sup> 鍾天啟，〈瓦礫寮裡的楊逵〉，《自立晚報》，1985.3.29。

陳儀抵臺不久刊行的《一陽週報》第八號，首頁有「歡迎陳儀長官率領國軍官員抵臺服務」的標語，楊達也以〈須以何答此禮物？〉回應剛就職的陳儀行政長官在松山機場演講時所言，自重慶帶來的六大禮物——不撒謊、不偷懶、不揩油、激發榮譽心、愛國心、責任心，呼籲臺灣同胞協力使臺灣成為真正的三民主義模範省，以此信條與實踐為臺灣為民國服務，才是答謝陳儀長官最好的回禮<sup>61</sup>。這些在在顯示臺灣人對於中國接收的喜悅之情，楊達本人也對於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釋出善意。

戰後臺灣知識菁英紛紛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楊達說自己雖然也常在臺中的三民主義青年團露面，但根本無意參加，而是「想根據自己的想法來建立自己的組織，採取自己的方針」<sup>62</sup>。從史實來看，楊達果真做了與眾不同的選擇，他與妻子葉陶、好友鍾逸人一同接收了臺中信用組合，夫婦倆並共同參與了國民黨臺中市黨部的籌備工作<sup>63</sup>。1945年12月13日，國民黨臺中黨員入黨儀式在臺中信用組合舉行<sup>64</sup>，楊達夫婦應該就在此時正式加入中國國民黨<sup>65</sup>。鍾逸人曾經表

---

<sup>61</sup> 楊達，〈須以何答此禮物？〉，《一陽週報》8號，頁1。

<sup>62</sup> 戴國輝、若林正丈訪問，〈台灣老社會運動家的回憶與展望——楊達關於日本、台灣、中國大陸的談話記錄〉，彭小妍主編，《楊達全集》第十四卷「資料卷」，頁282。

<sup>63</sup> 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下）》（臺北：前衛出版社，1995），頁400。

<sup>64</sup> 國民黨臺中黨員入黨儀式時間見林獻堂著，許雪姬編註，《灌園先生日記（十七）一九四五年》，頁420。

<sup>65</sup> 2003年4月7日，楊達次子楊建先生在臺中市東海花園接受筆者訪談時，親口證實了楊達夫婦曾在戰後加入中國國民黨。見拙著，《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四〇年代楊達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之附錄六：〈楊建先生訪談紀錄〉，頁506。

示，楊達之所以不加入三青團，係因不願屈居中部地區推廣團務負責人張信義手下<sup>66</sup>。從《一陽週報》的內容看來，楊達早有定見，是否進入三青團與私人交誼沒有直接關聯。極有可能是在解放委員會運作失敗之後，了解到籌組個人組織的不可行，又基於對當局實踐三民主義的能力仍有疑慮，楊達乃選擇進入統治核心的國民黨黨部，藉機發揮自己的影響力，以此親身實踐前述各同志前往「國民黨臺灣支部準備會」的主張，實際參與新臺灣的重建工作。

## 六、追求民主自治及其困境

從《一陽週報》內容來看，楊達所設定理想的政治藍圖，自然是以三民主義的民有、民治、民享為中心。基於民主自由的追求，楊達特別關切當局的相關措施。第七號的「週報」中刊載〈結社是自由〉（〈結社は自由〉），報導國民黨新生會解散之後引發的疑慮，藉由張士德上校在臺中接受記者訪問時所說，澄清易與依據中央部指令而組織的結社混淆者雖不予允許，一般民眾團體則不受干預的立場<sup>67</sup>。第八號中還以一整頁的篇幅，介紹臺灣各地包括農民協會、飛機公會、民官公吏、學生聯盟等各種不同的民眾組織蓬勃發展的現況。

二次大戰結束之後國民黨與共產黨的紛爭再起，楊達對此尤為關注。第七號「週報」的〈國共談判協議〉（〈國共交涉妥結〉）中，引述了以蔣介石與毛澤東為中心，國共兩黨所進行的談判後，於 1945

---

<sup>66</sup> 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下）》，頁 400。

<sup>67</sup> 〈結社は自由〉，《一陽週報》7 號，頁 2。

年 10 月 10 日發表的共同聲明<sup>68</sup>：

- 一、賦予中國全部政黨同等的合法性。
- 二、國共兩黨以防止內亂為目的，在蔣主席指導下全力以赴。
- 三、以全國各黨的代表組成政治諮詢會，檢討並決定關於召集國民大會代表的比率等技術問題。
- 五、准許個人良心、出版、言論、集會的自由，撤廢妨礙這自由的法律。
- 六、各政黨都具有合法的地位。
- 七、國民政府接受中共有關釋放政治犯的提議。
- 八、把現在四十八個師的中共軍縮小為二十個師。<sup>69</sup>

楊逵將國共兩黨在重慶發表的共同聲明作為重要大事予以報導，引述包括保障個人自由與建立民主聯合政府，以及國共兩黨團結以防止內亂等，與自由、民主、和平密切相關之協議內容，傳達出楊逵對於政局的關心與和平建設新中國的冀望。然而歷史的發展往往出人意料之外，協議發表不久，國共兩黨即陷入全面內戰的狀態。

有關臺灣政治體制的運作方面，《一陽週報》也提供了重要的思

---

<sup>68</sup> 《一陽週報》記載共同聲明發表時間為 1945 年 10 月 11 日，應該是指協議簽訂後隔日報紙刊載的時間。

<sup>69</sup> 譯自〈國共交涉妥結〉，《一陽週報》7 號，頁 2。此處引文依原文，缺標號四及相關文字。

考方向。例如第七號中刊登 1945 年 9 月 1 日回臺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張士德，於 10 月 12 日的談話內容：

中國三民主義青年團是為抗戰建國而產生，結集了新的力量集中、但是、當此抗戰得勝、還有重大課題在後。是什麼？就是為三民主義的徹底的實現而奮鬥。以三民主義教育代替奴隸教育、開除日本精神的殘滓、提高民族精神、推擴民權、確立自治、充足民生。未達這等重大的任務、團的結束需要堅固。<sup>70</sup>

其中顯示「自治」的確立被列為中國三民主義青年團設立的目的之一，楊逵選錄這篇茶話會演講內容當有認同之意。第十二號則不僅選錄〈地方自治機構〉一文列為刊頭，封面也以特大的字體標明「地方自治機構」，將楊逵心目中臺灣的理想政治型態明確指向自治。

隨著國軍入臺與接收政府正式運作之後，《一陽週報》從最初以〈新建設的基礎〉(〈新建設の礎石〉)<sup>71</sup>呼籲六百萬島民覺悟做為建設臺灣的基石，配合政府攜來的計畫，逐漸展露批判的精神，其中不乏借古喻今之意。例如第九號刊載的〈如何紀念 總理誕辰〉，作者鄧澤如在敘述孫文的志業與偉大人格、思想、精神之後，提到負黨國之

---

<sup>70</sup> 引自〈青年是新建設的原動力——張士德上校於醉月樓茶話會演講要旨——〉，《一陽週報》7 號，頁 2。

<sup>71</sup> 本文在創刊號發表時以日文刊載，第三號中再以中文重新發表，不管中、日文，都是該號中第一頁的第一篇文章，主編楊逵重視的情形由此可見。

責者不但不能繼志述事，反而與三民主義背道而馳，不只不能發揚黨國之光榮、反而陷黨國於分崩殘破之局，對不起孫文與同志同胞。又說：「然而中國國民黨為領導國民革命之集團、吾人自不能任彼元惡大兇、陽假黨國之名、陰行其毀黨禍國之事、吾人為救國、救黨計、惟有秉 總理組黨建國之初衷、一致團結、務必芟除此敗類而後已。」<sup>72</sup>不僅大力撻伐黨中的敗類，並強烈建議為了黨國的將來必須予以剷除。

這篇文章之後，緊接著刊載作於孫文誕辰六十八週年（1934年）的〈紀念 總理誕辰的感想〉，作者路幼剛在歌誦孫文的革命功業與「大公無我」之後，嚴詞痛斥當時擁有最高的軍權政權的份子，自私自利，排斥異己，不惜賣國固位，罔民斂財，甚於昔日的軍閥；不惜屈膝於外敵，獻媚於軍閥，甚於昔日的官僚。並批判當局不僅斷送東北四省的領土主權，不特不以為恥辱，還壓抑國內抵抗敵人的民眾，來和敵人親善。又說：

三民主義是 總理所殷囑我們同志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按：「徹」之誤）的。現在做到怎麼樣呢？最高當局既嫻外抑內墮毀國家的人格、摧殘民族的精神、國際地位益有日益低落、民族的自由平等、不知何時可期！軍閥獨裁、支配一切、大有「朕即國家」的氣概！近便組織所謂什麼中國法西斯蒂的結社、以

---

<sup>72</sup> 引自鄧澤如，〈如何紀念 總理誕辰〉，《一陽週報》9號，頁5。

發展獨裁政治、中央黨部及政府且不能自由行使職權、更有什麼民權可言！人民外受帝國主義的經濟壓迫、內受軍閥的剝（按：「剝」之誤）削、加以貪官污吏的榨取、土匪的蹂躪、不特農村經濟已形崩潰、即都市經濟益日趨於衰頹！民日窮、而國家財政愈困、賦歛愈急、挺（按：「鋌」之誤）而走險者愈多、互為因果、而民生愈不可救藥。建設的話、更不用說了！<sup>73</sup>

文中直指中國政治體制有極權主義與吏治敗壞之弊，經濟方面則承受財政困頓與民生凋敝之苦。接著作者呼籲全黨同志團結一致制裁獨裁軍閥，消滅革命障礙的殘餘，完成三民主義的建設。

從文章發表的時間來看，路幼剛批判的對象是時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並擁有國民政府實際領導權的蔣介石。《一陽週報》刊載〈紀念 總理誕辰的感想〉時，題目之下有楊達以「編者」身分所加的按語：「此篇系（按：「係」之誤）十二年前之作、今日時勢已經不同、但為自肅自勉之戒轉載之」<sup>74</sup>。由此可見，最遲在接收政府實際運作之後，親身體驗了所謂重慶軍閥政權的領導風格，楊達已深切洞悉國民黨內軍閥專權的根本問題，並深刻了解戰後欲展開新建設，必先對抗蔣介石獨裁政權。

除此之外，楊達在自身撰寫的〈紀念 孫總理誕辰〉中表示：「清

---

<sup>73</sup> 引自路幼剛，〈紀念 總理誕辰的感想〉，《一陽週報》9號，頁6-7。

<sup>74</sup> 引自《一陽週報》9號，頁5。

明認識先生的思想、鬥志及為人、來規正我們的思想、鬥志及為人、以繼承先生偉大事業。才是先生所喜歡的紀念方法。」又說孫文的偉大與思念孫文之處，在於「始終一貫、必信必忠、在艱難不矢志、在榮耀不腐化、堅決守節到底」<sup>75</sup>。以此對照前引鄧澤如〈如何紀念 總理誕辰〉，不難發現其中頗有批判當權者的微言大義。針對臺灣正進行著的新建設，楊逵說：

未戰而得勝的臺灣光復、雖是可慶可祝、總是因此若抱着中國革命為如卓（按：「桌」之誤）頂拿柑之安易感、那就慘了。光復了後的新建設目前多難、民權民生的徹底解決尚有多端、孫中山先生的思想與主義的完善發展全掛在我們肩上。夙夜少刻都不可撒謊、不可偷懶、不可揩（按：「揩」之誤）油、始終一貫以總理的思想、鬥志及為人當做羅針自檢自規奮鬥、才得達到美滿的社會。千萬不可抱著安易感、學日本紳士改裝換面就傲然成了新紳士這樣慘荷。此類是總理始終痛恨唾棄的劣紳。<sup>76</sup>

提醒臺灣民眾必須深切體認民權、民生建設之不易後，再次呼應陳儀初抵臺灣，在臺北松山機場廣播時所說「不撒謊、不偷懶、不揩油」的勗勉之詞，並勉勵臺灣人不可學日本殖民時代的御用紳士，轉而成

---

<sup>75</sup> 楊逵，〈紀念 孫總理誕辰〉，《一陽週報》9號，頁2。

<sup>76</sup> 引自楊逵，〈紀念 孫總理誕辰〉，《一陽週報》9號，頁2。

為新政權的依附者。一方面，傳達對陳儀政府秉持三民主義的理想，以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建設臺灣社會的期待；另一方面，卻也透露出楊逵對於臺灣前途的憂心忡忡。

## 七、結語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無條件投降，在臺灣總督執行天皇承諾的既定原則下，臺灣由中華民國政府接收成為無可避免的命運。儘管戰爭一結束，楊逵立即籌組解放委員會，希望以自己的組織從事政治活動，但由於本地領導階級與總督府的未予支持而遭受挫敗。之後，楊逵創刊《一陽週報》，以公開的園地提供各界討論臺灣的未來規劃，並宣揚孫文思想與三民主義，藉此推動政治思想的啟蒙，希望在民有、民治、民享的願景下，具體實踐經濟平等富足與地方自治的理想藍圖。

主編《一陽週報》期間，楊逵主動參與籌組中國國民黨臺中市黨部，身體力行《一陽週報》中前往國民黨臺灣支部準備會的見解，積極投身其所謂依據三民主義的新臺灣建設。然而美好前景遲遲未能實現，楊逵對於背離三民主義的國民黨政權逐漸失去認同。1945年11月17日，《一陽週報》發行「紀念 孫總理誕辰特輯」，藉由選錄紀念孫文誕辰的文章，楊逵寄託了對國民黨內軍閥專權與反民主的批判，隱約透露了對於政局的不滿和憂慮。

1946年8月，戰爭結束剛好滿一周年，楊逵在《新知識》發表〈為此一年哭〉，痛陳貪官污吏橫行，打破舊枷鎖才有了新鐵鍊，哭民國

不民主，哭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未獲得保障，堅定地表示爭取自由民主的決心。1947年1月，楊逵在《文化交流》發表〈阿Q畫圓圈〉，藉魯迅名著〈阿Q正傳〉中的阿Q生怕被人笑話，於是使盡了平生的力氣，想要把行狀上的圓圈畫圓，結果圓圈還是少了一角，批判自稱「禮義廉恥之邦」的中國政府連阿Q都不如，感嘆「雖有幾個禮義廉恥欠信之士得在此大動亂之下再發其大財，平民凡夫在飢寒交迫中總會不喜歡他們的」<sup>77</sup>，隱言諷刺陳儀有關臺灣新建設的承諾失信於民。隔月，二二八事件爆發，楊逵發表〈從速編成下鄉工作隊〉，呼籲在爭取自由無限制普選而產生自治權的這階段，須要包容各界與無黨派，擴大民主統一戰線<sup>78</sup>。一向主張和平抗爭的楊逵並憤而與葉陶下鄉組訓農村青年，為二七武裝部隊開拓兵源<sup>79</sup>，事件後繫獄一百零五天<sup>80</sup>。因對國民黨灰心，楊逵以黨費未繳的方式自然退出國民黨<sup>81</sup>。

《一陽週報》創刊於1945年9月1日，是目前所知二次大戰結束後臺灣最早出現的綜合性雜誌，在臺灣出版界重要的歷史地位自不待

---

<sup>77</sup> 楊逵，〈阿Q畫圓圈〉，原載於《文化交流》1輯（1947.1），收於彭小妍主編，第十卷「詩文卷」（下），頁231-232。

<sup>78</sup> 楊逵，〈從速編成下鄉工作隊〉，原載於《自由日報》，1947.3.9，收於彭小妍主編，第十卷「詩文卷」（下），頁239-240。

<sup>79</sup> 楊逵口述，王麗華記錄，〈關於楊逵回憶錄筆記〉，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四卷「資料卷」，頁82；鍾逸人，《辛酸六十年》，頁512。

<sup>80</sup> 楊逵口述，楊翠筆記，〈我的心聲〉，原載於《自立晚報》，1985.3.29，收於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四卷「資料卷」，頁67。

<sup>81</sup> 拙著，《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四〇年代楊逵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之附錄六：〈楊建先生訪談紀錄〉，頁506。

言，政局更迭中楊逵的迅速回應亦由此可見一斑。回顧楊逵生前，《一陽週報》中所憧憬的三民主義美麗新世界自始至終未曾來到，然該刊清楚標誌著戰後初期臺灣人民熱烈歡迎中國政府的心情，以及臺灣人民對以三民主義建設民主均富社會的熱切期待，足以窺見戰後政治轉型期中臺灣人的精神圖像，有其無法抹滅的時代意義。

附錄：〈一陽週報〉現存各號刊載作品一覽表

期數	日期	作者	篇名	備註
第一號 (創刊號)	1945年9月1日 (星期六)		新建設の礎石	論壇
			展望	
			獨立運動反對	
			一陽來復	詩
			總理遺訓——關於三民主義——	
		孫逸仙	致蘇聯書	
第二號	1945年9月8日 (星期六)			
第三號	1945年9月15日 (星期六)		新建設的基礎	論說
			中國國民黨黨歌	歌詞與 簡譜
			指導者	論說
			明朗的政治	
			蔣主席與日本	台灣新 報社說 大意
		蔡嵩林	偉大的光明	詩
			一陽來復	詩

			明朗なる政治	論説
			お願い	
		林（台南）	再教育について	紙上議 會（二）
		賴（新竹）	再教育対策委員会の設置 を要望	紙上議 會（二）
			展望	
		陳小□	大同団結の為に	□為字 跡模糊 而無法 辨識者
第四號	1945年9月22日 （星期六）			
第五號	1945年9月29日 （星期六）			
第六號	1945年10月6日 （星期六）		慶祝双十節	
		吳北海	若き血潮	
			新生活運動標語	
第七號	1945年10月27日 （星期六）		人山人海合歡此日——双 十節の盛典を語る	

			青年是新建設的原動力—— ——張士德上校於醉月樓茶 話會演講要旨——	
		小民	夢と現實	詩
			週報（〈結社は自由〉、〈國 共交渉妥結〉、〈自由な新聞 を世界平和の住家たらし めよ〉、〈ソ聯が五ヶ年計劃 實現に示した勇猛心に習 へ〉）	
		孫中山	中國革命史綱要（上）	
		達夫	三民主義大要（一）	
		楊逵	犬猿隣組（上）	小説
			孫文先生略傳（上）	
		孫文	欲改造新國家當實行三民 主義	
第八號	1945年11月3日 （星期六）	楊逵	須以何答此禮物？	
			臺灣光復・土地還原	
			臺灣光復・工要出頭	
		孫文	農民大聯合（上）	
		孫文	中國工人解放途徑（上）	

		孫文	民國教育家の任務	
			孫文先生略傳（中）	
		達夫	三民主義大要（二）	
		孫文	中國革命史綱要（中）	
		楊逵	犬猿隣組（中）	小說
		茅盾	創造（上）	小說
第九號 （紀念 孫總理誕 辰特輯）	1945年11月17日 （星期六）	楊逵	紀念 孫總理誕辰	
		蕭佛成	紀念 總理誕辰	
		鄧澤如	如何紀念 總理誕辰	
		陸幼剛	紀念 總理誕辰的感想	
		胡漢民	紀念 總理誕辰的兩個意 義	
			孫文先生略傳（下）	
		孫文	中國工人解放途徑（中）	
		孫文	農民大聯合（中）	
		孫中山	中國革命史綱要（下の一）	
		達夫	三民主義大要（三）	
		楊逵	犬猿隣組（下）	小說
		茅盾	創造（二）	小說
		第十號	1945年11月24日 （星期六）	孫文
	孫文先生略傳（四）			

		孫文	中國工人解放途徑（下）	
		達夫	三民主義大要（四）	
		孫中山	中國革命史綱要（下の二）	
		小民	千萬長者の話——怪紳士 列傳（1）	
		茅盾	創造（三）	小說
第十一號	1945年12月1日 （星期六）			
第十二號	1945年12月9日 （星期日）		地方自治機構	
		孫文	中國革命史綱要	
		達夫	三民主義大要（六）	
		茅盾	創造（五）	小說

附註：

1. 第二、四、五、十一號未見，發行日為推算所得。第十二號封面所印「九日」的發行日期為星期日，可能係排版錯誤所致。
2. 第七號刊載之〈人山人海合歡此日——双十節の盛典を語る〉討論會於三民主義青年團臺中分團籌備處召開，主持人為更與，與談人有三民主義青年團的林培英、鍾逸人，學生聯盟的林月鏡、吳清水、柯萬蛟，中民青年會的林茂雄，人民協會的楊克煌，一陽週報社的許青鸞、葉陶、吳北海。
3. 第八號起作者茅盾的「茅」字原誤植為「矛」，表格中已予以更正。

## 參考文獻

### 1、一陽週報

- 楊逵主編，《一陽週報》1號（1945年9月1日）。
- 楊逵主編，《一陽週報》3號（1945年9月15日）。
- 楊逵主編，《一陽週報》6號（1945年10月6日）。
- 楊逵主編，《一陽週報》7號（1945年10月27日）。
- 楊逵主編，《一陽週報》8號（1945年11月3日）。
- 楊逵主編，《一陽週報》9號（1945年11月17日）。
- 楊逵主編，《一陽週報》10號（1945年11月24日）。
- 楊逵主編，《一陽週報》12號（1945年12月9日）。

### 2、專書

- 林獻堂著，許雪姬編註，《灌園先生日記（十七）一九四五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0）。
- 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卷「詩文卷」（下）（臺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2001）。
- 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四卷「資料卷」（臺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2001）。
- 黃惠禎，《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四〇年代楊逵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9）。
- 路寒袖主編，《台中縣作家與作品論文集：台灣文學研討會》（臺中縣豐原市：臺中縣立文化中心，2000）。
- 鈴木茂夫資料提供，蘇瑤崇主編，《最後的台灣總督府：1944-1946 終戰資料集》（臺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4）。
- 賴澤涵總主筆，《「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
- 戴國輝、葉芸芸，《愛憎二·二八——神話與史實：解開歷史之謎》（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6）。
- 鍾逸人，《辛酸六十年》（臺北：自由時代出版社，1988）。
- 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下）》（臺北：前衛出版社，1995）。

### 3、期刊論文

- 葉芸芸，〈試論戰後初期的臺灣智識份子及其文學活動（一九四五年——一九四九年）〉，《文季》2卷5期（1985.6），頁1-18。
- 藍博洲，〈楊逵與中共台灣地下黨的關係初探〉，《批判與再造》12期（2004.10），頁39-58。

### 4、雜誌文章

- 池田敏雄著，廖祖堯摘譯，〈戰敗後日記〉，《臺灣文藝》85期（1983.11），頁179-194。
- 戴國輝、內村剛介訪問，陳中原譯，〈楊逵的七十七年歲月——一九八二年楊逵先生訪問日本的談話記錄〉，《文季》1卷4期（1983.11），頁8-30。

## 5、報紙文章

〈カイロ宣言とは〉，《臺灣新報》，1945.8.17。

〈時局急變と本島の今後 安藤總督談——全島民一丸の團結 誠實熱心・新運命開拓へ〉，《臺灣新報》，1945.8.24。

〈臺灣に陳儀 接收委員〉，《臺灣新報》，1945.8.27。

〈臺灣民政長官に陳儀任命〉，《臺灣新報》，1945.9.1。

楊資崩，〈我的父親楊逵〉，《聯合報》，1986.8.7。

鍾天啟，〈瓦寮寮裡的楊逵〉，《自立晚報》，1985.3.29-30。

